

蒙古史研究

ᠮᠤᠩᠭᠤᠯᠤᠯ ᠰᠢᠷᠭᠠᠨ ᠰᠠᠭᠤᠨ ᠰᠠᠭᠤᠨ

第八辑

中国蒙古史学会



STUDIA HISTORICA MONGOLICA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K281.2-53

4

:8

蒙古史研究



中国蒙古史学会

第八辑

特布信教授八十寿辰纪念专集

STUDIA HISTORICA MONGOLICA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史研究. 第8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6

ISBN 7-81074-838-6

I. 蒙… II. 齐… III. 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文集 IV. K28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4043 号

书 名	蒙古史研究(第八辑)
主 编	齐木德道尔吉
责任编辑	和 平
封面设计	敖全英
排 版	包国庆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010010)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内 蒙 古 地 矿 印 刷 厂
开 本	787×1092/16
印 张	27.125
插 页	4
字 数	614 千
版 期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7-81074-838-6/K·58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蒙古史研究》第八辑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蒙古史研究》第八辑编辑委员会

齐木德道尔吉 乌云毕力格 金海 宝音德力根

周太平 希都日古 宝音特古斯

主 编 齐木德道尔吉

编 辑 包国庆 巴根那

学长益友 为人师表

——贺特布信教授 80 寿辰

郝维民

我与特布信教授相识、相处，在一起工作整整 43 个年头。在他 80 华诞之际，忆往事，使我浮想联翩。就学术而言，他是我的学长；就品德而言，他是为人师表的楷模；就个人关系而言，他是我的益友。

特布信教授是一位具有特殊经历的学者、领导干部。他的经历显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印记。

特布信(Töbšin)教授，蒙古哈日奴特(Haranud)氏，全名特布信敖其尔(Töbšinočir)，汉名乌书春，1925 年 3 月 17 日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管旗章京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蒙汉文教育。1942 年参加留日预备班，1943 年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大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在海外留学的蒙古族青年之一。时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的所为，时刻关注祖国的命运，日夜思念民族的前途，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了解世界，有幸得到马、恩、列、斯等伟人的著作，俄国十月革命的信息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资料，渐渐萌发了救国救民族的念头。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他毅然回到祖国，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一方面从事教育工作，一方面密切注视时势的发展。日本投降后，他与万民共享胜利喜悦的同时，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虑。在风云突变的时刻，东蒙古兴起了蒙古民族运动。他加入东蒙古有识之士组织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赞成以该党名义发表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中协助苏蒙联军驱逐日寇，铲除封建势力，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实行民族平等，联合中国革命力量，为蒙古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政治主张。他在东蒙干部学校以教员和政治队长的身份，讲授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政治课，宣讲蒙古民族解放问题，是东蒙第一位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蒙古族青年，不少年长于他的学生至

今仍恭敬地称他为老师。

1946 年“四三”会议统一了东西蒙自治运动，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地位，他担任联合会兴安盟分会主任，时年 21 岁，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 年 5 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他被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员，参与民族区域自治的领导工作。1949 年 4 月，为发展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的民族工作，内蒙古党委从东蒙抽调 160 多名蒙古族干部，在内蒙古党委委员、自治政府民政部部长奎璧率领下，由特布信、李文精领队，西进绥蒙。他走马上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在乌兰察布草原上整整工作了 8 年多时间，经历了剿匪肃特镇反、农村土地改革、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民主改革、农牧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同时为恢复与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奔波。在交通不便的草原、山区，他骑着马走遍了农村牧区，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心里装着人民，脑里记着民族。我听过与他共事的老同志和乌兰察布草原上老牧民叙说的关于他的故事，说他是文化、有知识、有水平、知民心的好领导。

1957 年，内蒙古党委为了加速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调特布信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他以务实的作风，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出版事业，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以出版事业促进文化、教育的任务。在自治区成立 10 周年前夕，他发表了《蓬勃发展的人民出版事业》的文章，全面总结了自治区的出版事业，热情讴歌了内蒙古文化与出版事业的巨大成就，字里行间闪现着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深情。

这一年 5 月，自治区成立 10 周年庆典过后，党的整风运动开始。正值中央和内蒙古党委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之际，他根据当时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内蒙古党委全区宣传工作会议和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少数民族干部座谈会上，以多年基层民族工作的实际体会与思考，就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蒙汉民族关系、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以及党的领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正确意见，受到与会者的赞扬。但是 1957 年的夏天政治风云突变，一场迅猛的反右派斗争来临。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内蒙古党委也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在全国反右派斗争高潮中，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成为少数民族中整风、社教的中心内容。特布信等同志在上述会议上的发言便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10 月 31 日《内蒙古日报》

发表社论，并陆续配发批判文章，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地方民族主义。特布信同志莫名其妙地遭到这场“左”倾扩大化风暴的袭击，戏剧性地被打成蒙古族干部中民族右派的第一号人物，年仅 32 岁。一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蒙古族年轻领导干部落入了那场政治旋涡。1958 年 1 月，在自治区党代会上做出了开除特布信党籍的决定，当时乌兰夫同志虽持不同意见，但未奏效。之后，他的人生岁月是怎么度过的？不言而喻。

经受无情的批判斗争之后，他被发派到农村改造，后来被安排到内蒙艺术学校当教员。1961 年，调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蒙语专业任教。1962 年调到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从事蒙古史研究工作，这也是我与特布信同志相识的开始。他时年 37 岁，大我 9 岁。当时我是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起初，我心存疑虑，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的坦诚、和蔼以及渊博的学识慢慢地感动了我。1963 年冬，黄时鉴先生我们 3 人合写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长篇学术论文，他对文章的基本框架、基本内容、基本观点发表了关键性意见，提供了重要史料，经过共同研究，由黄时鉴执笔撰稿而成。1964 年我们带着这篇论文参加了全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反响良好。这是以论文形式第一次系统反映近代内蒙古革命历史的开创性之作。当时，由于他被委屈的身份，不便在论文上署真实姓名，故署集体笔名“蒙图索德”，是“蒙古史研究”蒙古语的缩写。直到 1982 年该文收入《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一辑时，才署真实姓名黄时鉴、特布信和郝维民。

1965 年，蒙古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内蒙古史纲》，特布信同志执笔近代部分。是秋，派他和黄时鉴、金峰先生到北京、辽宁等地区档案馆查阅档案，搜集资料。但是，派他出去查阅历史档案便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学校领导严肃地批评了我，并要求以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为由立即调回，这使我十分为难。回来后不久，学校领导又要求立即调离呼市，派往伊盟参加“四清”。为了不使特布信同志疑虑，派卫庆怀同志同往。他们去伊盟报到后又以分别派遣为名，特布信前往所派地，卫庆怀当即返回学校。究竟为什么如此对待特布信同志，当时我不知底细，后来研究这段历史才有所悟。当时，党内“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界继续发展，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加码，内蒙古大学以蒙古族教师布仁赛音为靶子批判民族分裂主义，中共中央华北局主要领导人矛头直指乌兰夫。乌兰夫无奈，不得不对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有所表示，同时在“四清”中批判无视民族特点的大汉族主义。两相对阵，斗争激烈，特布信同志又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实际是“文化

大革命”一开始，即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批斗乌兰夫的前奏。

在“文革”中，特布信同志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直到1973年才从军管监禁中释放回校。是时，内蒙古大学恢复了蒙古史研究工作，我任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1975年，我们共同组织编写《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我任编写组组长，特布信任副组长。本书的架构设计，基本内容的确定，基本观点的确立，都是特布信同志提出来的，实际上发挥了主编的作用。1978年出版时，我提出编写人员署名他应名列第一，他不同意，要坚持原来的名序，和我争论起来。这是他的学识和在本书编写中的作用，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对我感染的结果。

1979年1月，按中央的决定改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恢复了他的领导职务，先后担任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书记、校长，一度兼任蒙古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的曲折，虽然使他耽误了风华正茂的22年时光，但是他毫无怨言地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学校的蒙古学，特别是蒙古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1985年卸任后，仍然关注蒙古学研究事业，我们共同指导培养研究生，直到90年代初。

特布信同志恢复领导职务以后，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和组织内蒙古近现代历史研究工作。1980年初，他要我一起向国家教育部申请招收中国民族史专业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只是助教，而且因不公正待遇被撤职；他当时也没有评职称，仅是教员。我提出疑问时，他说：“不要管这些，这个领域的人已经散了，仅剩我俩，这是我们培养研究人员，进行学科建设的重要一步。”经申请，幸获批准，我们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当年即招了两名硕士研究生，这是研究队伍建设的可贵的第一步。1981年，我提出逐步建立研究机构的想法，他欣然同意，先成立了《内蒙古革命史》编写组，他当组长，我为副组长，向自治区政府申请了3个人编制和每年2万元经费，又借调了两位研究人员，搭起了架子，开始工作。1982年秋，在此基础上，经内蒙古党委批准，成立了内蒙古大学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研究所，后又加称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一个机构两个名称。在特布信教授的直接领导下，建成了以本科生、研究生为主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渐渐面世，成为国内外研究内蒙古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惟一专门机构。我无职主持这摊工作3年之后，在他的不断干预下，才被任命为所长。这不单是我们彼此的信任 and 个人的交情，更是事业使命的驱使。

这么多年来，我们相处共事，对往事感受颇多，印象深刻，永志不忘。首先，他不记已往的委曲得失，以事业为重，放眼未来，潜心创业。几十年来，对所受的委曲从不诉说冤情，总是从大局出发看待那段历史。而且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于特布信教授复职后的全部工作，我没有资格评论，仅就蒙古学研究和民族教育而言，他提出了不少创新设想，付诸实施，而且打开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渠道，开创了研究工作的新阶段，这是公认的事实。

其次，主持公道，待人真诚，广开言路，民主共事，是他为人的品格，对事的原则。在我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被撤职后，剥夺了我参加学术会议、从事研究工作的资格。他和他的夫人德力格尔玛同志一起为我鸣不平，主持公道，恢复了我的权利；支持我继续内蒙古革命史的研究，力荐担任内蒙古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革命史编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为我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我建议招考研究生，考生可以任选蒙文或汉文答卷，会蒙文者亦可加试蒙文，为蒙语授课考生创造参加考试的条件，他欣然同意，当即批准实施。只要想干事，他就会支持，而且为之创造条件。

第三，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科学严谨的学术作风，坚定正确的学术方向。对以往的研究既有继承，又有批评，更注重创新，指导学科建设健康发展。他在 20 多年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苦心钻研学术，对蒙古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但是，由于在新时期伊始，学校要恢复正常，改革刚刚起步，他无暇直接从事研究工作，只能通过各种学术会议、讲学、个人交流、培养研究生等形式，阐述蒙古史、近现代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见解，发挥了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一个学术带头人，组织学科队伍，指导学科建设，进行集体学术攻关，是学术发展的关键。这就是特布信教授最大的学术贡献。

2005 年 5 月 4 日于内蒙古大学

目 录

学长益友 为人师表(代前言)	郝维民(1)
说契丹辽朝前期四楼、捺钵与斡鲁朵的关系	任爱君(1)
关于《元朝秘史》书名问题之再探讨	方龄贵(20)
成吉思汗与西夏	陈育宁 汤晓芳(31)
故建威都尉夫人王氏墓志及相关问题	于宝东(36)
朝鲜世宗《训民正音》与元世祖的八思巴文字	[韩国]崔东权(45)
元代蒙古语同北方汉语语言接触的文献学考察	祖生利(52)
亦邻真教授复德国庞纬博士信	亦邻真 (80)
元上都城址的考古学研究	魏坚(86)
元代宫廷大宴考	[台湾]袁冀(116)
“天魔”舞的传播及渊源	王颀(133)
元代云南教育考	王风雷 张敏杰(143)
关于《元朝秘史》中的“马阿里黑·伯牙兀歹”	乌兰(152)
《蒙古秘史》和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渊源初探	希都日古(158)

也先干涉明朝帝位考述	毕奥南(166)
蒙古历藏历汉历例说	黄明信 申晓亭(181)
阿勒坦汗与明朝之间的佛教关系	乔吉(191)
论东土默特蒙古	乌云毕力格(206)
蒙古汗国最后都城林丹汗察罕浩特考(蒙古文)	那仁朝格图 金峰(237)
准噶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与蒙古区域史研究	哈斯巴根(257)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旗制的演替	那日苏(271)
19 世纪蒙古地区反清斗争的形式(英文)	[德国]V·法依特(299)
法库	李勤璞(309)
多伦汇宗寺在清代边疆史上的意义	任月海(334)
1912 年至 1913 年期间喀尔喀军队进犯内蒙古	[俄罗斯]E.A.别洛夫(342)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教育体系	金海(348)
中共关于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四个纲领性文献	李玉伟(355)
博彦满都佚文四篇	博彦满都 (363)
绥远蒙古文化促进会及其《醒蒙月刊》	忒莫勒(377)
漫议西部大开发与蒙古族的发展 ——兼评少数民族“去政治化”和民族“共治”	郝维民(384)

.....	הוא (384)
הוא (377)	הוא (377)
הוא (363)	הוא (363)
הוא (355)	הוא (355)
הוא (348)	הוא (348)
הוא (342)	הוא (342)
הוא (334)	הוא (334)
הוא (309)	הוא (309)
הוא (299)	הוא (299)
הוא (271)	הוא (271)
הוא (257)	הוא (257)
הוא (237)	הוא (237)
הוא (206)	הוא (206)
הוא (191)	הוא (191)
הוא (181)	הוא (181)
הוא (166)	הוא (166)

CONTESTS

Professor Tobshin: good teacher, worthy friend and man of decency

(Preface)	Hao Weimin (1)
A discussion of relationship among Silou, Nabo and	
Ordu in early Liao Dynasty	Ren Aijun (1)
Reexamination of the Booktitle of <i>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i>	Fang Linggui (20)
Chinggis Khan and Xi Xia Dynasty (Tanggut).....	Chen Yuning and Tang Xiaofang (31)
Gianwei Duwei 's wife Madam Wang's tomb inscription and	
relevant issues	Yu Baodong (36)
Emperor Shinzong's <i>Hun em jun un</i> and Khubilai	
Khan's Pagspa writing system	[Korea]Choi Donggean (45)
A textual analysis of linguistic contact between Mongolian and	
Northern Chinese during Yuan Dynasty	Zu Shengli (52)
Prof. Irenchin's letter to Dr. Werner Banck	Irenchin (80)
An archeological study of remains of Shangdu capital of Yuan Dynasty	Wei Jian (86)
An examination of court banquet during Yuan Dynasty	Yuan Ji (116)
Diffusion and origin of dance of "Goddess"	Wang Ting (133)
Research of education in Yunnan	
during Yuan Dynasty	Wang Fenglei and Zhang Minjie (143)
"ma'alig ba'adai" in <i>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i>	Ulaan (152)
Initial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i> and	
the 17 th century Mongolian historical chronicles.....	Shudurgu (158)
Discussion of Esen's interference into emperorship of Ming Dynasty	Bi Aonan (166)
Interpretation of Mongolian, Tibetan and	
Chinese calendars	Shen Xiaoting and Huang Mingxin (181)
Religious contacts between Altan Khan and Ming Dynasty	Choi ji (191)
On eastern Tumed Mongols	B • Oyunbilig (206)
Examination of the last capital of Mongolian empire	
Ligdan Khan's Chaganhot (Mongolian).....	Naranchogt and Altan-orgil (237)
A Study of official archives of Jungar Banner and regional	
history of Mongols	Hasbagan (257)

Changes of administration system in Tumed Banner of	
Guihua Municipality in Qing Dynasty	Narsu (271)
Forms of Mongolian protest against the Qing	
rule in the 19 th century (English)	[Germany]Veronika Veit (299)
On Faku.....	Li Qinpu (309)
Significance of Dolon-nuur's Huizong Monastery in	
frontier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Ren Yuehai (334)
Khalkha Mongolian military action to	
Inner Mongolia from 1912 to 1913	[Russia] E •A • Belov (342)
Western Inner Mongolian educational system under Japanese colonel rule	Jinhai (348)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ur guideline	
documents of Inner Mongolian issues	Li Yuwei (355)
Four essays	Buyanmandah (363)
Mongolian Culture Promotion Council of Suiyuan and its monthly	
“Mongyol-i sergügekü sar-a-yin darumal”	Tuimer (377)
Discussion of “development program in western China”:	
concurrent comment of “depolitica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multi-ethnic groups' autonomy”	Hao Weimin (384)

说契丹辽朝前期四楼、捺钵与斡鲁朵的关系

任爱君*

契丹辽朝政权的行朝（或行国）政治状态，学界已有大量的探讨，¹笔者也曾经以“契丹族俗对其国家体制的影响”为题作过系列探讨。²究其特点，就是在施行“因俗而治”的基础上，坚持和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政权特色，在“分治”的前提下仍然继承和发展了游牧民族的社会传统和生活习俗，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以前任何民族政权的统治体系及政治结构等。因此，北宋神宗对契丹辽朝政权的基本看法，就是说明问题的典型材料。史称：神宗与王安石厉行变法之际，遭到了契丹人态度强硬的“划界”问题的干扰，陷于内外交困的地步，迫于无奈，不由得感慨而言：

唐明皇晚年逸豫，以致祸乱。如本朝（即自指北宋—笔者）无前世离宫别馆、
游豫奢侈之事，非特不为，亦无余力可为也！盖北有强敌，西有黠羌，朝廷汲汲
枝梧不暇。然二敌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自古外夷能行而已，今兼
中国之所有，比之汉唐尤为强盛也！³

所谓“城国”，即指城郭以治的农业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而“行国”即指随逐水草、迁徙无常的游牧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宋神宗认为，古代的北方游牧社会仅能造成“行国”（即行朝政治）的局面，但是现在的契丹政权却兼备了“行国”与“城国”的两套体制！这就使得仅能“城国”体制的北宋政权，要想再像汉唐那样来制服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了。但是，强大的契丹辽朝政权的灵魂是什么？主要还是它的行朝政治体制。而契丹辽朝行朝政治的核心，就在于其独具特色的斡鲁朵（即宫卫制度）和捺钵（即行营制度）的政治结构及其作用。⁴斡鲁朵和捺钵，原本都是契丹人自古相传的生活方式与

*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¹ 参见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李桂枝《辽金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日）岛田正郎《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台湾《大陆杂志》1964年第29卷12期；李锡厚《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² 拙作《阿保机时期契丹国家的历史特点》，《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3期；《辽朝国家体制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1年4期；《辽宋共存共亡的政治格局及其文化意义》，载93赤峰《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出版社（北京）1996年。

³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8，元丰五年七月乙未条。

⁴ 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968年1期；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载氏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6年。

社会习俗，契丹辽朝时期将这些传统性的东西保留下来，不仅赋予了其普遍的文化意义，而且还赋予了它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使其成为在习俗现象、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等方面都兼而有之，是社会习惯法与封建法典相辅相成的国家律法，它贯穿了契丹辽朝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各个层面，是契丹辽朝政权统治的核心与根本措施。

本文所要探讨的“四时捺钵和楼居习惯”，就是对于契丹辽朝所采取的游牧与农耕两种统治方式同时并存的“两元政治”体系中，那种直接产生于北方游牧社会的基本统治制度及其形式的研讨。

如所周知，契丹辽朝自太祖阿保机时起，就已经确立了“因俗而治”的基本框架，并在以后历史发展中被奉为主臬，演变成契丹辽朝历代君主都恪守不易的祖传遗制。在这种基本精神的直接指导下，太祖时期逐渐树立的用中原地区的“汉制”（即中原封建统治制度），来管理汉族等农业人口；用北方草原地区的“蕃制”（即北方游牧社会统治制度），来管理契丹等游牧部落人口的统治方略；在太宗和世宗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使其成为具有高度的程式化、体系化和结构化、制度化的法律依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南、北面官”统治体系。这种南面官和北面官制度，是在辽太宗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而在辽世宗时期得到基本完善；从此，所谓“官分南北”，也就成为契丹辽朝区别于以前历朝历代和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的鲜明标志，这也是契丹辽朝所以被后世判定为“两元政治”体制的直接由来。¹我们主要沿用前人的这种基本看法，试图对契丹辽朝北面官制度的基本形式，条分缕析，作出基本的判断。

一 契丹人四时捺钵的来源

所谓“四时捺钵”，其实就是指契丹辽朝时期曾经长期存在的季节性、游动式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生活方式被直接地引入到契丹辽朝的政治生活当中，成为契丹辽朝的皇帝所要恪守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因为，任何朝代的皇帝的生活，都总是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所以，契丹辽朝皇帝所恪守的“四时捺钵”活动，也就同时成为了契丹辽朝政权的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社会现象，甚至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关于“四时捺钵”的具体形式和特殊作用，前辈学者傅乐焕先生在其名著《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及《广平淀续考》，²已言之凿凿；关于“四时捺钵”在辽朝、金朝以及元朝，甚至清朝等古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中的共生现象等问题，则有姚从吾等所作的阐发，³已揭示其性质与内涵。故于此所要探究的，也仅是被前辈学者们忽略和未能阐发的起源问题。

据《辽史》记载：

¹（日）津田左右吉《辽朝制度之二重体系》，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12卷，岩波书店1964年；岛田正郎《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台湾《大陆杂志》1964年第29卷12期。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的礼俗生活》，台北《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968年1期。

²见氏著《辽史丛考》。

³前揭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的礼俗生活》，及《说契丹的捺钵文化》，载《东北史论丛》下册，台北中正书局，1959年。